

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 心理学的历史贡献*

周 晓 虹

1908年,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几乎同时出版了各自撰写的社会心理学教本,并因此成为社会心理学学科诞生的标志。1929年,加德纳·墨菲在《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一书中由此回溯,找出了形成社会心理学的两种主要的理论渊源,并进而划定了两种不同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墨菲写道:“当社会心理学形成时,它趋向于分为两枝,一枝是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社会情境中的个人,一枝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团体生活”。^①

墨菲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规划了从那以后有关社会心理学发展的论述。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诸如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之类的问题,人们都不得不回到墨菲,甚而回到麦独孤和罗斯的“巧遇”。但是,墨菲的分析毕竟只是“当社会心理学形成时”的最初状况,他并没有说(事实也不是如此),在社会心理学兹后的发展进程中,没有遭际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冲击和影响。本文意图证实传统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源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事实证明,除却社会学和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低估的历史贡献。社会心理学是一只有着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这样三条坚实的金鼎。

一、文化人类学介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线索

1860年,德国人类学家巴斯典的《历史中的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人类学的诞生。在兹后60余年中,巴斯典、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诸多文化人类学大师的“绝大部分人类学研究都侧重于文化特质的分析”(本尼迪克特),并不注重文化对个人人格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因此,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文化人类学对当时刚刚诞生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一) 弗洛伊德

1913年,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通过一个十分大胆而又着实荒诞的臆测,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向社会心理学投出了试探性的、但却颇为有力的一掷。原始人把图腾看成是自己的共同祖先或原始父亲,弗洛伊德由此入手触及了图腾崇拜和外婚制这两种原始社会常见的禁忌现象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前提。在《图腾与禁忌》中,他将原始民族对图腾既崇拜又恐惧的矛盾态度和父亲对儿子的矛盾态度作了相似的类比,认为这两个现象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因:俄迪

* 本文是在孔令智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全文近三万字,发表时作了删节。

① 加德纳·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译本,第607页。

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弗洛伊德信心十足地写道：“要是图腾动物即代表父亲，那么，图腾观的两个主要制度，也是由两个禁忌所构成——禁止屠杀图腾和禁止与同一图腾的妇女发生关系——正好和俄迪浦斯的两个罪恶有着隐隐相互映的地方（他杀害了父亲而与母亲结婚）。要是这种假设正确，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对图腾观的起源作一有利的实破。”^①

实事求是地说，弗洛伊德并不是第一个涉足人类学的心理学家。在《图腾与禁忌》发表的15年前，即1898年英国剑桥人类学家去托列斯海峡的远征队中，就有过三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其中包括10年以后写出了第一本《社会心理学导论》的麦独孤。但是，对人类学素材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取舍和描述的第一人却是弗洛伊德。力图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阐述人类心理的发展，这是弗洛伊德理论的长处。但是，在弗洛伊德那里，形成人的本质的各种个人关系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则是生物的而不是社会的，因为这些关系都在普遍的俄迪浦斯情结的影响和制约之下。

弗洛伊德对人类学的涉足，使原先潜心研究各种文化特征的人类学家从惊愕中掉过头来。一方面，弗洛伊德唤起了文化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在我们此后的论述中将会看到，文化人类学家对该领域的介入，又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为先导的。

（二）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能够成为人类学家迈向社会心理学征途上的重要路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结于他是一个极易为他人的成就所激动的人。如果说，是弗雷泽的《金枝》将这个理学博士引进了人类学的殿堂的话，那么，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则是促成他翌年赴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最直接诱因。

在西太平洋上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多年生活，为马林诺夫斯基验证、评判弗洛伊德的学说，创立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将两性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研究作为《原始社会的性及压抑》和《美拉尼西亚西北部原始人的性生活》两书的主题，显然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过，客观地说，马林诺夫斯基对弗洛伊德的兴趣并不在其泛性主义理论之上，而在于这一理论之中包含的明显的“社会学性质”。因为“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说全盘布景都是受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限制——那就是包括父、母以及子女在内的小范围的家庭”。^②显然家庭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形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家庭结构既然不是某一社会或文化的偶然标志——从根本上说它取决于民族文明的性质和进化的水平，马林诺夫斯基当然就有理由向弗洛伊德提出疑问：“家庭以内的冲突、情欲、依恋等是因家庭组织的不同而不同呢，还是普遍的人类都是一样的呢？”^③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亲子之间关系并进而决定整个家庭内部矛盾的俄迪浦斯情结仅仅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但未必通用于象美拉尼西亚人那样的母权制社会。

马林诺夫斯基的验证奠基于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其一，父权制社会中常见的父子冲突在美拉尼西亚人的母权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在那里，代替父亲在社会及儿童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舅舅，舅舅对外甥（女）有直接的支配权。因此，男孩子对舅舅怀有崇敬但又厌恶的矛盾心理。其二，美拉尼西亚儿童被严厉禁止亲近的对象是姐妹而不是母亲，所以那种被

①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译本，第165页。

②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中译本，第2页。

③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第4页。

压抑的乱伦欲念的对象只能是他们的姐妹。由此，马林诺夫斯基推论：“我们不妨说父权社会的恋母情结有杀父娶母的被压抑的欲望；但在特罗布里恩德的母系社会，则有杀舅舅娶姐妹的欲望。”^①

马林诺夫斯基还进一步通过分析特罗布里恩德的神话传说来证实他的结论，他发现美拉尼西亚人没有类似俄迪浦斯的传说，但兄妹乱伦却构成了他们神话的主题。

马林诺夫斯基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否认俄迪浦斯情结的普遍性，是以承认性在家庭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为前提的。在特罗布里恩德，舅舅代替了父亲执行社会规范的限制，对姐妹的禁忌代替了禁止和母亲亲近的警律，杀父娶母的“俄迪浦斯情结”就自然让位于杀舅舅娶姐妹的欲念，这种对弗洛伊德的表面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论证。因而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不过是产生于父权社会的弗洛伊德理论运用于母权社会的变式。

（三）波亚士、本尼迪克特和米德

在自1886年起的4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社会心理学一直是波亚士殚思竭虑的主题。最初他就深信，通过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分析，就能够对社会的心理基础予以研究。在《原始人的心理》一书中，波亚士写道：“社会群体的团结和与外群的对抗，协作和服从的形式与动机，对待来自外部的影响的模仿与抵抗，个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竞争，劳动的分工，联合与分离，对于超自然事物的态度——这些人们很少提及的东西，都能够予以调查研究。”^②虽然波亚士深信，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可以使社会心理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对于能否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归纳出一般的社会心理学法则，却没有十分的把握。应该说，弗洛伊德对人类学的涉足在激发马林诺夫斯基的同时也给了波亚士全新的启迪。弗洛伊德对早年生活在人格形成中的决定作用的重视，使他摆脱了多年来无法具体验证人们的心理特征是如何随着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苦恼，并使他愈发加深了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

弗洛伊德的影响和波亚士本人的心理学的转向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两位女弟子的研究取向。从20年代中叶起，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开始以人性、人格和文化变迁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现场研究，力图揭示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

本尼迪克特1934年发表的《文化模式》一书，被米德称之为“20世纪30年代最伟大的书藉之一”，而杰弗里·戈雷尔则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对国民性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始。

本尼迪克特深信人类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因此，每一个个别文化都只是涵纳在这种无限之中的部分元素所构成的一个“形貌”，这种结合各具体元素所构成的形貌才是该文化的精神。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母题，围绕着这一母题体现出该文化外在的习俗、制度和行为。因此，研究文化的具体特质是不能和总体的文化网络相脱离的。否则，“我们纵使明白了一个部落的婚姻形态、礼仪、舞蹈、成年仪式等等的细节，也可能还不了解其文化的整体形貌。”^③不了解该文化的本质。这一看法显然受惠于哥式塔心理学，在她看来，文化大于它的全部具体特征之和。

和本尼迪克特的“不研究个人，也没有个人生活史”（维持·巴诺语）的研究相比，米德则更注意个人生活史的描述。她的现场研究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问题进行的——比如，1928年发表的《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一书关注的是青春期和文化的关系问题，1930年发

①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中译本，第78-79页。

② 弗·波亚士：《原始人的心理》，英文版，第675页。

③ M·米德：《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英文版，第289页。

表的《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一书所涉及的是儿童教育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而1935年发表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一书则立足于性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三本书以后被合为一辑《来自南海》）——这种方法对于人类学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米德的研究受惠于下述几个方面：其一，波亚士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胆揣测，是米德在文化与人格研究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契机。1925年，即米德动身去萨摩亚之前，波亚士就写道：“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年轻姑娘对习俗的限制会有何反应。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经常地会发现，正值豆蔻年华的青年男女，会在愠怒不乐或脾气突发中，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我并不十分了解原始社会发生类似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①如果说波亚士的疑惑是促成米德萨摩亚之行的主要原因，那么，她自1929年起对性与气质关系的调查同样从波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获得了直接的启发。其二，斯坦利·霍尔认为青春期危机是伴随着生理变化而产生的特定的心理反应，与此相似，弗洛伊德认为，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两性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是米德对原始部落的现场调查和理论阐释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可以说，正是霍尔和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从反面促成了米德的文化决定论的形成。

以西方文化文明为背景进行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是米德全部调查的特色之一。米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未割裂与当代社会的联系，这是她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

（四）林顿、卡丁纳和杜波依丝

30年代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影响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弗罗姆等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否定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而代之以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并因此称为“文化学派”。他们力图探求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尤其在人格错乱方面），文化因素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的。

当时，秉承了精神分析传统的除了基本上由心理学家组成的文化学派以外，还有一些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深感“心理动力学中的文化学派，对于社会科学并没有产生持久的贡献”（卡丁纳语），转而另辟蹊径研究文化和人格的关系问题，即不但研究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和作用，而且从相反的方面研究个人的心理构成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

沿着文化人类学派介入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线索，我们发现美国哥伦比亚人类学系在社会心理学的短暂历史上占有着突出的地位。实际上，自波亚士入哥伦比亚之后，哥大人类学系就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产生了浓厚而持续不断的兴趣。就此而言，哥大人类学系就是社会心理学系。这里，可以十分妥贴地借用奥托·克林伯的评判：“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系，在整个世界上这种类型的社会心理学系也是第一个”。^①对此赞誉哥伦比亚的人类学家是受之无愧的，无论是1936年前以波亚士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研究工作，还是1936年后以林顿等人代表的研究工作，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界都具有无可非议的开拓性质。他们以“文化与人格”为主题开展的一系列现场研究和精深分析（这两个学派因此被人们合称为“文化与人格学派”），是文化人类学派对社会心理学做出的最为直接的贡献。

^① 引自威廉·S·萨哈金：《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体系》，英文版，第156页。

二、文化与人格研究是文化人类学家的直接贡献

文化是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而对人格以及受人格影响的人的行为的分析,则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兴趣所在。自19世纪生物学通过达尔文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之后,该学科的观点对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领域,“本能”的概念成了麦独孤和弗洛伊德等人阐释自己理论的踏脚石。

上述事实决定了文化人类学家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批判先前理论(主要是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的基础上,从文化的角度对人格的发展做出自己的阐释,而文化与人格研究也因此构成了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亚领域。

以1936年为界,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为主进行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以波亚士及其弟子为代表,注重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的影响;第二阶段,以林顿等人为代表,注重文化与人格的交互作用,尤其注重形成了的人格是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文化结构的。

(一) 人格的文化决定论

人格的文化决定论最早的倡导者是弗朗士·波亚士。波亚士对当时在心理学等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决定论的怀疑,首先来自他对爱斯基摩人和范库弗岛克压奎特印地安人的研究。从那里,他发现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文化和人格的关系问题。他将全部疑虑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看法写成了《原始人的心理》一书。该书的德文版书名《文化和遗传》更接近波亚士的本意,因为该书通篇讨论的正是文化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关系问题。

在波亚士看来,人的行为习惯和全部文化活动并不取决于身体的功能和解剖结构。人的心理因素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组织因素,因而人格,即人的心理特征也就会随着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白人文化的侵入、部落生活的解体,不能不导致印地安人的心理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从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中,产生了波亚士的人格的文化决定论,即人格以及受人格制约的社会行为特征的不同取决于人们所受的文化影响不同。

对文化决定论的第一个具体验证来自米德1925—1926年对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萨摩亚人青春问题的现场研究。两年以后,米德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扛鼎之作《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方文明所做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正如作者日后所说的那样,她力图通过这项研究了解“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①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萨摩亚的几个月生活中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米德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在心理上也不会出现危机和突变。米德认为,造成萨摩亚的姑娘们能够舒缓、平和地渡过青春期的原因在于:首先,萨摩亚社会具有一种宁静淡泊的本质,他们对周围的事物缺乏深刻的感受,也不会将整个感情全部投进去,而“在一

^① 米德:《来自南海》序言,英文版,第vii页。

个缺乏强烈感情撞击的地方，青春期的姑娘是不会受到任何过于强烈的心理折磨的”。^①其次，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模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那种骚动与压抑。

米德的研究第一次为波亚士倡导的人格的文化决定论提供了确凿而具体的证据，以致有人声称，《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人类学青春期的到来”。在20年代，企图通过人类学的调查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米德的举动对当时的社会心理学不能不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她成功地向人们证实，诸如青春期危机等等原先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的某种反应”（波亚士语）。

波亚士倡导的文化决定论自30年代以后，逐渐演化为“文化相对论”，即不同的文化对人们的人格以及受人格制约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这一转变充分体现了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特征，因为文化相对论所强调的正是“不同的文化”对人格发展的不同影响。

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在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和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等著作中做了充分的阐释。《文化模式》涉及到三个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而论述的重点又在本尼迪克特本人做过现场研究的祖尼族印地安人和其导师波亚士做过现场研究的克封奎特族印地安人。因为正是这两个就生理体质而言同属一个种族的印地安人在社会行为上的对立，促成了本尼迪克特从文化因素入手，了解人格以及社会行为的形成原因。在她看来，祖尼人肯定人生，“慎行中屑五道”，祖尼文化属于“日神精神”，克压奎特人追逐地位和财产，举止过度，克瓦奎特文化属于“酒神精神”。祖尼人和克压奎特人正好体现了本尼迪克特的两种典型的文化精神。

通过对原始文化的论述，本尼迪克特进一步论及了个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1930年，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由于只有在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和性满足的前提下，群体才可以组织起来，文化自然是令人灰心的。对于这种将社会或文化与个人对立起来的作法，本尼迪克特是极不表赞同的，“社会和个人并不是对立者。文化提供素材，个人用以生活”。文化提供了个人用以塑造自己生活的原始材料，因此，“文化贫瘠，个人如涸池之鱼；文化丰盛，个人则可得阴其荣”。^②在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中，尽管她强调的是文化对个人的制约和决定作用，但她并未完全否认个人生活的自主性。社会并不是和组成它的个体相脱离的存在，因为它的成份是无数个体的贡献之和。文化也同样不能够完全剔除它的个体的个人气质的。文化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强化和影响的关系，这使“我们讨论文化模式时，就不能不特别考虑到它和个人心理的关系了”。^③

在《文化模式》发表的第二年，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又一次将人格的文化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之间的争论推向了高潮。

在米德之前，人们对男女两性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所做的解释大多是生物决定论的。其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在1933年发表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把女性的人格发展的基本特征归为三个方面，即被动性、受虐性和自恋性。在他看来，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由此弗洛伊德将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归于两性

① 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英文版，第200页。

②③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英文版，第300页，第301页。

所具有的不同的人理解剖结构。这样，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

抱着对上述观点的怀疑，米德于1929年奔赴新几内亚研究了三个相邻而居的原始部落。她发现，这3个部落虽然共同居住在方圆100公里的范围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差异：阿拉佩什人认为男女两性在人格和行为方面不应该也确实不存在性别差异，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不论男女从幼年起都被要求懂得爱与体贴他人；蒙杜古马人则和阿拉佩什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男女从哇哇坠地之日起都被要求成为进攻性的人；而德昌布利人的性别角色规范恰好和文明社会相反，那里的女性“具有支配感，不为感情因素所左右，具有经营能力，而男性则缺少责任感，感情上的依赖性较强”。^①从这些确凿的事实出发，米德有力地指出：“所谓男性和女性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②

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著作都体现了一种浓厚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她们一致认为，文化模式和个人的性格与习惯行为都必须从历史的、文化的，而不仅仅是生物的、心理的取向来理解。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出发，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人格特征，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普遍的、永恒的、超文化的人格，不考虑特定社会的规范，就没有人格的常态与变态之分。在本尼迪克特里那里，克压奎特人所崇尚的首领，都是文明社会所嫌弃的“偏执狂”，而在米德的《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中，做一个文雅、体贴人的情郎在马奴人看来是一种变态人格，相反，做一个强奸者、窥淫者、色情狂却是十分正常的。

以1936年为界将文化与人格研究划分成两个历史阶段的作法并不一定十分合适。因为1936年以后，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在文化与人格研究中依然十分活跃。兹后，本尼迪克特以对日本文化所做的分析写成的《菊与剑》(1946年)，米德以7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为材料写成的《男性与女性：变迁世界中的性的研究》(1949年)和研究代沟问题的著作《文化与承诺》(1970年)都继续丰富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自1936年以后，占主要地位的则是研究文化与人格关系的另一条途径。

(二) 文化与人格的交互作用论

在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中，1936年后以林顿等人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与此之前的波亚士等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尽管前者也是以批判弗洛伊德理论为自己的研究宗旨的，但在方法上却明显秉承了精神分析的传统。具体说，他们虽然否认本能力量(包括性本能)是人格塑造的决定性因素，但仍然坚持从童年早期的经验入手寻求人格的起源和形成。

如果说波亚士等人的研究已经“成功地说明了人格在极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萨哈金语)，那么，作为后继者，林顿等人则进一步企图找出决定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典型性的人格。这类人格，林顿称之为“基本人格类型”，卡丁纳誉之为基本人格结构”，而杜波依丝则求助于统计学，创造了“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的概念。在哥伦比亚心理分析学派的人类学家那里，能够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人格，正是这种在某一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典型性的人格。

林顿的全部观点体现在他1936年写成的《人的研究》及1945年写成的《人格的社会背景》两书中。在他看来，每一文化的成员都有一系列共同的人格特征，它形成了个体之间基

^{①②} 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英文版，第279页、第5页。

本相似的人格丛，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这种人格丛就是“基本的人格类型”。

这种基本的人格类型是由文化塑造的，具体说来，是由既定社会中的成员所运用的多多少少相似的训导和哺育儿童的方法所塑造的。由此，林顿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一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人格结构（即基本人格类型）是他们共同的早期经验的结果。这种人格观从未摆脱过“童年决定论”的制约，所不同的只是用“训导和哺育儿童的方法”取代了本能的驱力。而将文化简单地归结为训导和哺育儿童的方法，这种文化观显然是十分狭窄的，它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人的人格以及社会行为的影响。

当然，林顿的讨论并不乏出色之处。在波亚士等人的文化决定论中潜在地蛰伏着这样一个难题，如果人格的形成完全受制于文化因素，那么，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个人之间还存不存在人格上的差异？林顿所创设的“基本人格类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林顿看来，文化所决定的只是基本人格类型，它并不等于每个个人的具体人格（这是丰富多彩的），但却和个人的投射系统相一致，换言之，和作为个人的人格结构基础的社会共有的价值——态度体系相一致。它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反映出来，就形成了每个人的具体人格，但要进一步解释这种具体的人格，仅局限于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发现非文化的因素。

文化对“基本人格结构”的塑造并不是林顿论述的中心。在他看来，个人的心理结构对文化的影响和构造，并不亚于文化对个人的人格的影响和塑造。人格的文化决定论开始让位于文化与人格的交互作用论。林顿写道：“文化从个人的人格以及人格间的互动中获得了它的全部特征。反过来，社会中的每个个人的人格也在与社会文化的持续不断的联系中发展着、活动着。人格影响着文化，文化也影响着人格。”^①

文化对人格的依赖关系，决定了每一社会对新事物的反应都依基本的人格类型而转移，这确实是一个超前性的结论。1939年，卡丁纳在其《个人及其社会》一书中，正是沿此方向更进一步展开了人格对于文化的影响和构造的论述。

卡丁纳将代表文化特质的制度分成两大层次：一为“初级制度”，包括家庭组织、群体结构、基本训练、哺乳和断奶的方式、肛门期训练、性的禁忌以及谋生技能，这些较为古老而稳定的制度是塑模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结构的工具，这体现了文化对人格塑造的决定作用；另一为“次级制度”，这是由形成了的基本人格结构通过投射系统所塑造的，包括民俗、宗教仪式、禁忌系统以及思维方式等，基本人格结构正是通过这些次级制度转而对文化予以影响的。在卡丁纳看来，次级制度产生了某些心理丛，引起了个体的需要和紧张，而次级制度则可以通过介于初级制度和次级制度之间的基本人格结构去满足需要、缓解紧张。

卡丁纳对制度的划分多少给人以机械、牵强的感觉，这一点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从1945年出版的《社会的心理疆界》中，能够从上述概念的使用减少上明显地发现卡丁纳的修正意识。不过，尽管他很少再谈及基本人格结构对次级制度的塑造，但却进一步阐发了人格能够对文化结构予以影响、构造的思想。他开始将基本的人格结构定义为“存在于—既定社会中的心理特征的集合。”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文化间的区别和差异，自然会将一文化和他文化的不同归咎于该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结构”，即自己的“基本人格结构”，而这种“基本人格结构虽不能够决定某一文化的全部变迁，但它提供了方向，规定了适应性的文化变化所发生的方式。”^②

① 林顿：《人的研究》，英文版，第464页。

② 卡丁纳：《社会的心理疆界》，英文版，第454页。

认为基本人格结构为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向,规定了文化变化的方式,这种能动的人格观是林顿关于每一个社会对新事物的反应都依基本的人格类型而转移的天才见解的深化和继续。它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既然文化变迁依基本人格结构而转移,那么,其间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就必须考虑到制度的人的心理意义,以及制度的变迁如何适应人的感情的习惯,否则就难以有科学的制度。如果能够考虑到个体与其生存的文化中的特殊制度之间的关系,心理科学的成果也就能够应用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文化和人格的交互作用论经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个女人人类学家杜波依丝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将她在该领域的贡献简要地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林顿的“基本人格类型”和卡丁纳的“基本人格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众数人格”概念。从对印度西尼亚阿罗岛人的研究中,杜波依丝发现,阿罗人彼此间的人格特征都有相当大的变异性,“但是,这些变异幅度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线上获得的。在这个基线上,资料将会显示出中心趋势,而构成每一特定社会的众数人格”。^①用通过资料的统计获得的“众数人格”代替抽象的“基本人格类型”或“基本人格结构”,这对于人格研究的具体化、数量化和科学化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其二,杜波依丝的研究由于其方法论上的创新(比如她成功地运用了罗夏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等心理测量方法),成为整个文化与人格研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个案研究。这项研究既丰富了林顿等人的文化和人格的交互作用论,也修正了早期的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某些不足,并因此成为这一领域中的新的里程碑。

三、文化人类学家的跨文化研究的历史意义及其评价

把构成西方文化的西方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自动遵循的标准当成是通见于全人类的,这是社会心理学在本世纪初形成之时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是西方文明的产儿,它“置根于西方思想与文明的富有特色的土壤之中”(奥尔波特语)。而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诞生于本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明的色彩,决定了“社会心理学那时大部分已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②其二,随着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的进化论取得了对人类行为的由来进行解释的无可争议的地位,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心理学也十分自然地将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奠基于生物学之上。在麦独孤那里,本能成了一切社会行为的基础;往后,到了弗洛伊德手中,麦独孤的18种本能更是被代之以独一无二的本能——“性本能”。而一旦“本能”的概念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全部说明,当时的社会心理学在以西方人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结论,也就自然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意义。

“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我都可以把他们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1924年,行为主义者华生率先对人类行为的本能论解释表示自己强烈的不满,并因此和麦独孤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争论。华生的呼吁既表达了人们要求根据科学来形成的控制自己行为的愿望,同时也流露出极端的环境决定论的倾向。

在这场遗传和环境究竟何为人类行为的起因的新的争论中,文化人类学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行为主义一边。米德明确声称:“人类学家……从对其他文明中的成人行为的观察出

① 杜波依丝:《阿罗人:一个东印度岛的社会心理研究》,英文版,第4—5页。

② 墨菲等:《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译本,第615页。

发, 获得了许多行为主义者对幼儿行为的描述相似的结论。”^① 这类结论自20年代以后, 在文化人类学界风涌迭出。而这些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获得的结论, 由于其浓郁的异国情调和历历在案的具体分析而使得人们更易接受。随着文化人类学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个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跨文化研究报道, 以往西方人习惯上所认为的属于人类本性中的固定成份的行为的诸多层面, 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当时, 对于年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 由文化人类学所进行的每一次跨文化研究都是一次令其震撼的冲击。在此之前, 社会心理学正如前述, 基本上是“一种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在这种社会心理学的面前, 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充分证实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意义, 从而表明, 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社会行为模式的描述和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

在社会心理学的短暂历史上, 这是一次至今仍为人所忽视、但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如同麦独孤时代的心理学家使社会心理学向生物学让步, 以哥伦比亚“文化与人格学派”为主体的文化人类学家开始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自此之后, 在社会心理学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中, 本能论、普遍论让位于文化论、差别论; 单从本世纪后期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每每谈及人类行为之时, 都小心翼翼地冠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 人们都不难觉察文化人类学的历史功绩。

应该指出的是, 在人格以及行为模式的解释上, 这一发端于20年代末洎乎三、四十年代的否定普遍论、绝对论, 代之以文化论、差别论的倾向, 并不单单出现在文化人类学界。文化决定论尤其是其后的演变形态文化相对论的产生,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理论来源。20世纪初, 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宁, 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并终于导致了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而至的十月革命。战争和革命的双重影响以及在此前后出现的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上的一系列突破, 首先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研究中反映了出来。“欧洲中心论”连同历史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信仰, 这些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所信奉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观念摇摇欲倾。1918年, 德国史学家斯本格勒出版了那本名噪遐迩的历史巨著《西方的没落》, 明确宣称任何思想家都只能在他所生活的条件下进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不存在什么普遍永恒的东西。这一大胆的见解一方面使先前由欧洲史学家们所勾勒的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成为戏谈, 另一方面也带有否认历史有规律可循的相对主义倾向。

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相对主义观点, 不能不对文化人类学, 这个直接接触外族文化的学科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整个西方所呈现的没落趋势之前, 无论是人类学的演化学派(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演化的最先进体现), 还是传播学派(各族文化都由西类文化传播而来)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 波亚士、本尼迪克特、米德以及众多后来者开始不仅承认文化的多样性, 而且进一步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合理性。在《文化模式》一书中, 本尼迪克特指出“在社会学及心理学的领域里, 文化相对性的观念都具有根本重要性”之后, 接着申明“一旦这套新观念成为根深蒂固的信仰…我们将认识到, 人类利用生存资源而创造出的种种生活模式, 都同样有效, 更应该共存”。^② 应该说这种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所持的肯定态度, 决定了文化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论观点和以斯本格勒为代表的历史相对主义观点是有区别的。当然, 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尤其是米

① 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 英文版, 第4页。

②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英文版, 第326—327页。

德)一味强调人格及人类行为对文化的依赖性,相对论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否认了人的主动性和人类行为的遗传性和客观性,既带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也带有机械决定论的性质。文化与人格研究自50年代以后曾一度从研究的热点上跌落下来,可以说是这种偏颇导致的直接结果。

完成了对于文化人类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及其历史意义的论述之后,接着,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人类学家的跨文化研究做出粗线的评价。

一、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说明了在人格及人类行为的塑造方面文化品素比生物品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忽略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他们在拆除本能力量决定了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谎言的同时,又描绘了一部新的神话,“让人以为是文化在使役人类”(斯普拉德利语)。

论及文化,人们多会援引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泰勒的定义着重于强调“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把文化放在群体互动的社会行为中考察,从社会学的角度介说文化,这是泰勒定义的长处;但这一定义正因为着眼于个人的“能力与习惯”,所以其内涵是十分有限的。文化,从较为广阔的意思上说,应该包括物质层、制度层和心理层,而泰勒的定义显然忽视了前两个层次尤其是物质层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的地位。泰勒的文化观对兹后的文化人类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米德、本尼迪克特,还是林顿、卡丁纳,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都没有超出泰勒所划定的意义,在米德那里,造成萨摩亚人能够平和地渡过青春期的主要原因在于萨摩亚人的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文化缺少的“宁静淡泊”的本质;在本尼迪克特那里,造成祖尼人和克瓦奎特人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原因在于两者的文化精神不同;到了林顿和卡丁纳,尽管他们比前人更进一步涉及了文化的制度丛,但整个文化也不过被归结为训导和哺育儿童的方式,归结为母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式。

二、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向当时盛行的弗洛伊德主义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否认了本能力量对人格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的具体研究和分析并没有完全摆脱精神分析的影响,尤其在人格形成的说明上,依旧表现出了极端的“童年决定论”的倾向。这种观点从下述两个方面使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跨文化研究未能进一步深刻揭示文化与人格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一,由于他们强调童年早期的经验对人格形成的决定性影响,从而忽视了以后的社会化过程。而童年早期虽是人的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但决不会是终结时期。其二,他们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在人格发展中童年早期经验的强调。既然文化决定了人格,而人格的塑造又主要取决于个体在童年早期的文化学习中所获得的经验,那么,文化就自然会被等同于能使儿童获致这种经验的训导和哺育方式,等同于母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式。

三、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在强调文化对人格及行为塑造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忽视了生理和遗传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具有一定的生物遗传特征又生活于具体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全部心理特征(即人格),受着社会文化因素和生理遗传因素的双重影响。

二、三十年代,当麦独孤、弗洛伊德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十分盛行的时候,文化人类学家围绕着文化与人格的关系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人格和人的社会行为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但是,他们所持的“文化决定论”在阐释人类行为时,一开始就带有将社会文化因素和生物因素对立起来并且否认后者的倾向(如米德等人对青春期的研究)。这种偏颇使他们未能正确、全面地了解人格及人类行为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室

建室时间：1980年。是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全国建立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

研究方针和重点：立足地方，侧重应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探索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重点研究领域是社会协调发展、青年问题、人才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和青少年犯罪、劳动就业问题。

室组成情况：现有研究人员5人

主要活动和成果：1984年9月召开了“老年人问题”学术讨论会，1982年3月召开了“劳动就业问题”讨论会，1981年召开了“青少年犯罪问题”讨论会。研究室成员先后编辑了《老年人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劳动就业讨论会资料集》和《青少年犯罪问题讨论会资料集》。全室研究人员几年来在全国和省市等报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50余篇。

(叶乃滋)

四、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发展了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他们的研究第一次能够称之为科学的，但是，他们的记载还不能符合当代研究中所提出的精确性的要求和标准，他们对原始民族的调查大多是描述性的，而这种描述有时又只是为了符合先前业已形成的观点（如米德对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角色描述）。

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其影响在晚近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已日趋明显。1980年，由文化人类学家特雷安迪斯和朗伯特主编的《跨文化心理学大全》所以在社会心理学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瞩目，主要原因在于在其中的第五卷《社会心理学》卷中，文化人类学家首次将其所从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命名为“跨文化社会心理学”。至此，文化人类学家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彻底打破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由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双雄争霸的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足鼎立的阵势。对人类行为研究的具体化、多学科化，是这种研究从原始综合过渡到辩证综合的必经阶段。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三足鼎立的阵势还会被打破，并进而形成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更为全面综合的阐释。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严立贤